

让文艺之花为时代和人民绽放

——新政协筹备过程中的“第一次文代会”记忆

武龙女 桂星星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各大群众团体相继恢复和建立，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做了重要的组织准备。香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的《百川归海 人民至上——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建国实践专题展览》中展示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美术作品选集》等珍贵文物史料，便是这一段伟大历史时刻的生动见证。

第一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号召下，各路文艺队伍会师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与各解放区政协联席会议，筹备新的全国政协大会。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项具体事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中央希望将全国新文协会议的召开作为前奏，通过文艺聚集各方社会力量，统一思想，稳定民心，共同筹建新中国。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沟通筹委会的名单、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等问题。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文协史上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大会，国统区、解放区被隔离多年的两支文艺大军，在人民革命胜

利的旗帜下终于成功会师。

7月6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向代表们表示欢迎。在讲话中他强调指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人民需要你们。”

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报告。各代表团、各小组讨论了大会报告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草案），酝酿了各协会的组织问题；部分代表进行了专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与会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今后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提出面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

7月19日上午，第一次文代会闭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为主任，推选了常务委员及各部负责人，并通过全国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等协会及戏剧改革协会与曲艺改进会等为全国文联的会员。

7月21日至2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和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等陆续成立。

主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工农民主专政等理论。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六期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总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工农暴动的经验，阐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预估了在武装暴动政策下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以及城市武装暴动和农村武装暴动的关系，并提出了下一步武装斗争的指导方针，指明了全党的斗争方向。瞿秋白的《武装暴动问题》一文论述了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意义、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以及游击战争对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作用等问题。

关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蔡和森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



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徽章

见证新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光辉历史

《百川归海 人民至上——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建国实践专题展览》中，展示了一枚珍贵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徽章，徽章呈圆形，直径约25毫米，黄铜质地，上方有一正在展开的飘带，飘带上标有“1949”字样。徽章正中镌刻有毛泽东和鲁迅的侧面头像。文字及头像轮廓呈现出金黄色，配以褐铜质地的底色，使头像更加鲜亮醒目，形神毕肖。

1949年5月4日，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等各委员会主办的《文艺报》发布了作品征集启事，向全国征集文艺资料，能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在群众中有显著良好影响的均可以推荐。当时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品征集并不十分顺利。筹委会借助各解放区的党委和解放军各野战军和兵种政治部向全国各地征集作品，这个带有行政命令的通知起到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最终评选委员会共征集到文艺艺术作品3184种，美术作品1600余件，经过六次评选，其中绝大部分入选为展览作品。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

定期供稿给编辑部。地方通讯的稿件写作模式较为一致，先是介绍当地的背景（军阀混战的情况、工农受压迫的状况等），再说明具体情况，而后总结取得的成就、暴动的意义、影响以及教训。

1928年8月，瞿秋白卸任总编辑，由蔡和森接任。之后，“读者之声”与陈独秀主笔的“寸铁”两个栏目消失。11月，蔡和森卸任，李立三接任。之后，地方通讯专栏数量减少，社论、中国革命问题以及理论问题栏目数量上升。1929年3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就《布尔塞维克》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其存在出版编排工作潦草、语言令人费解等问题，认为应该在报刊中加入指导性的编辑部社论，充分论述党建问题和工农运动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固定的版面。最后，东方书记处指出：“尽管创办了平行的通俗周刊《红旗》，《布尔塞维克》因此成了双周刊，并且主要是中共的理论刊物，也应力求使语言通俗易懂，但又绝不影响内容理论水平。”李立三按照这些指示再次更改栏目，基本上隔

一期刊登一次马列主义理论相关的内容。1930年9月，李立三卸任，沈泽民接任总编辑。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正式将《布尔塞维克》从中央机关报更改为中央理论机关报，保留《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3月，张闻天接任总编辑后，按照理论机关报的要求全面取消了创刊初期的栏目，重新设置中国革命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经济进程分析及党的理论问题4个栏目，直至终刊。

从中央机关报到中央理论机关报

《布尔塞维克》是栏目调整最为频繁的中央机关报刊，每位总编辑上任之后都会对栏目和内容进行调整。《布尔塞维克》创刊之初按中央要求报刊设16个栏目：社论、国内政治、外交问题、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国革命问题、党内问题、理论问题、经济与财政、寸铁、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地方通讯、读者之声。从实际出版物来看，虽然不是每一期都开设所有的栏目，但整体上能够全部涵盖。最具特色的是“地方通讯”专栏，各地工农革命的领导者是该栏目的主要供稿人，他们按照中央的要求

建设同苏维埃根据地的关系，认为只有训练形成更强大的红军力量才能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而巩固已有的苏维埃根据地是当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

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此扩展和增强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理解。郑超麟翻译的列宁所著《工农革命民权独裁》指出：“工人阶级有独立的阶级政治组织发展的完全可能”，“要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来对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产生的国家政权”，提出无产阶级党“需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以及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布尔塞维克》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及革命书籍。如第一卷第二期和第七期最后一页，编辑部列出“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理论，建设新的革命理论”的相关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郭沫若著瞿秋白译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等。

《布尔塞维克》栏目频繁更改，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和复杂的历程。在近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以《布尔塞维克》为阵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意义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等理论做了诸多探讨。很好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在中共党报党刊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也同时举办，艺术展览会第一天就吸引了1300多名观众参观。为了进一步宣传新中国的文艺思想和方向，1950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辑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美术作品选集》，为12开规格线装本，发行量仅1万册，存世量稀少。封面设计简洁而富于特色，在“编辑例言”里，编者介绍，所选作品一部分是解放区的，“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辉煌的社会建设”，一部分是国统区的作品，“描绘的是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社会动态及人民的生活斗争”。“一方面是反映新中国的光明，一方面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

作品选集共分为绘画、木刻、年画、漫画及雕塑5个部分，其中绘画19幅（包括油画、水墨、水彩），木刻12幅，年画10幅，漫画13幅，雕塑8幅，总计62幅。作品选集充分体现了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联系人民群众，创作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共同描绘了文艺工作者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因此，这部作品被视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对于新中国的诞生献礼”。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确定参加新政协的46个单位及代表名额，其中，团体单位中全国文联共15人受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作者单位：香山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研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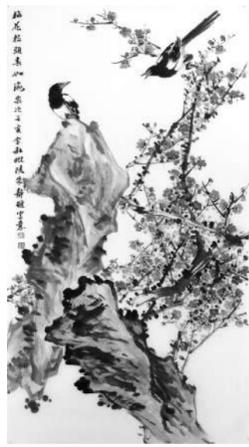
云梦之境——陆永安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陆永安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本报（记者 付裕）“云梦之境——陆永安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通过“梦之余”“致敬”“时空”“遐想”四个篇章，展出《向董源致敬》《向范宽致敬》《向李成致敬》《向石涛致敬》《梦想的力量》《四海一家》《百年无极》《愿见》等代表作品，呈现其立足扎根东方文化，借助西方绘画技术和材料，赋予传统中国画新的形态、色彩的美学思考。画展现场采用数字沉浸式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绘画艺术魅力。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陆永安曾跟随赵无极先生学习，他的作品中既充满着自由浪漫的西方气息，更渗透着自然飘逸的东方神韵。他与20世纪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留洋学画国的有志艺术家一样，都是在中西合璧的道路上，试图探索一条丰富的艺术道路。他借助西方绘画技巧，重塑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为中法文化艺术交流增添光彩。

现场，陆永安将自己的作品《百年无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陆永安表示，希望用探索与实践帮助更多新生代力量，助力美育事业发展。



梅花枝头春如海 (国画)

朱静雅作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故事

全根先

冶炼技术的发现，正如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一样，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冶炼技术最早诞生于伊朗。公元前3100年，叙利亚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人们开始广泛使用金属原料制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宽敞幽静的展览大厅里，有一些黄金制品格外引人注目，反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已掌握了较高的黄金加工工艺水平。有代表性的是出土于叙利亚埃勃拉遗址的一条项链，由一条细链和两个类似橡果的吊坠组成，吊坠分别由水晶和石头制成，细链则由小金环交织而成，十分精美。

艺术创作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活动，反映了人类对美的渴望与追求。人类对于美的渴望与追求，使外在世界和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在美索不达米亚，陶器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艺术品，不同时期的陶器风格反映了他们对美的不同理解和文化特征。其中，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滚印（又称圆筒印章），是美索不达米亚独特的艺术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微雕艺术，展示了他们所理解和创造出来的方寸之美。

美索不达米亚的珠宝不仅反映了两河流域人们对美的追求，还展示了他们超凡的艺术创造力。青金石是当时最珍贵的宝石之一，虽然当地并不出产，距这里最近的矿藏也远在阿富汗高原巴达克山地区，然而珠宝因其稀缺性而成为身份的象征。早期用贝壳和石块等材料制作的项链、手镯等，逐渐被黄金和珠宝首饰所取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珠宝匠师已掌握了雕刻镂空、凸纹制作、丝状饰品装饰和景泰蓝等技术。佩戴珠宝首饰十分普遍，且不论男女。男女都喜欢的珠宝，包括戒指、手镯和脚镯、臂环（戴在上臂）、耳环、项链，还有头针和胸针等。

走过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展览空间，不时在一件件展品前端详，笔者的思绪仿佛飘荡在数千年不断变幻的历史时空中，依稀看到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兴起和衰亡。从展览的“曙光”“变革”“争霸”“融合”进入到“对话”这个单元，笔者惊喜地见到了古代中国与叙利亚的文化交往。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被亚述人称为“塞米勒米斯之路”，它以中国为起点，穿越山海、沙漠、平原、山谷，连接数千城镇，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波斯等地区间建立联系，然后穿过叙利亚，直至欧洲和马格里布地区（非洲西北部）。

作为古代中国与叙利亚文化交流的实物遗存，有几件展品特别引人关注。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复制品），首页从右向左横书有15行叙利亚文，是研究景教传入中国的珍贵资料。一件是来自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丝绸织物”，发现于巴尔米拉的一处墓葬中，可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还有一件同样来自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一个蓝绿色陶碗，专家认为，其陶坯的改良可能是模仿了中国的制瓷技术。虽然当时该地区陶瓷技艺尚未达到中国制瓷技术水准，但这种陶器皿在当代叙利亚北部地区已大量生产。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中华文明虽然相距万里，独自绽放，风格迥异，而又交流互鉴，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断地书写了人类历史的光辉篇章。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马约翰：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鼓浪屿人民体育场旁的小广场上有一尊人物雕像，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清华大学大广场上，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人物雕像，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望正在锻炼的清华人。

这两座雕像南北呼应，刻画的人物是“中国现代体育之父”——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厦门鼓浪屿，是马约翰体育之路的起点。

马约翰（1882—1966），虽然名字和相貌都有点“洋味儿”，可他却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1882年，马约翰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他自幼好动，常与其他孩子们在山上、海滩上玩耍，不到天黑不回家，山环水抱的鼓浪屿为马约翰健康的身体素质创造出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马约翰自幼失去双亲，因家境困难13岁才入私塾读书。当时网球、足球等近代西式运动都已传入鼓浪屿，成为岛上学生们的日常运动项目，这自然而然的体育氛围也影响着马约翰。

1900年，马约翰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校期间，他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尤其喜欢田径，曾获得多个长跑项目的全校冠军。

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田径运动会，马约翰参加1英里赛跑。比赛很激烈，在最后冲刺时，马约翰以领先第2名50码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中国”的欢呼声响彻整个运动场。

当时，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一个羸弱的民族，有一项不过关便不能毕业。国学大师吴宓及作家梁实秋从清华毕业多年后仍对体育考试心有不甘，他们都曾因体测不合格而被退补考。

马约翰曾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中提到：“体育教育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在马约翰的言传身教下，“无体育，不清华”已经形成一种精神。在马约翰的故乡厦门鼓浪屿，人们将他故居旁人民体育场命名为“马约翰体育场”，并塑了一座马约翰的塑像以作纪念。以马约翰为代表的体育精神，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重要精神财富。

鼓浪屿上，这位为中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老人，依旧以他坚毅的目光，注视着这块生他养他、培养了他健康体魄和无私心灵的土地，他的体育精神也同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